

中国政治学早期抽样调查研究

——以《北京社会经济发展年度调查》（BAS） 的口述史为例^{*}

岳春颖 王大鹏^{*}

摘 要：抽样调查是在中国改革开放背景下，政治学学科恢复之后，进入中国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在早期阶段（1988—2002），中国政治学抽样调查研究的核心特征是以数据记载历史、奠定方法论基础和人才培养基础；研究主题主要围绕政府体制改革、社会变迁，以及民众对改革的感受、态度与行为展开；在方法论的技术层面，复杂概念的操作化主要参考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成熟量表，但是在问卷设计上也进行了本土化尝试，而且问卷中包含了对测量误差的识别变量；在抽样方面，直接参考成熟的多阶段概率抽样设计，并且经历了由户籍抽样到 GPS 辅助地址抽样的变迁；在这一阶段，中国政治学抽样调查确立了一套严格的实地入户面访的执行标准和程序。此外，在早期发展阶段，中国政治学抽样调查利用大学教育、专业培训、实地调研实习平台等方式迅速培养了最早的一批政治学量化研究人才。

关键词：中国政治学抽样调查；口述史；量化研究；政治发展

Abstract: Sample survey has entered into the academia after China's reform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计算社会科学背景下的政治学研究方法变革研究”（项目号：19BZZ010）的阶段成果。

^{**} 岳春颖，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助理，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访问学者；王大鹏，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助理，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访问学者，通讯作者。

and reestablish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discipline. In the early stage of research (1988-2002), the core characteristic of using sample survey was to record the history with data and lay the foundation of methodology and talent training. The research topics are mainly the changes of government system and society, as well as the attitude and behavior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people. As for the technology of methodology, the operationalization of complex concepts mainly refers to the mature survey scale in developed countr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In terms of the questionnaire design, localization attempts have been made, but have not been applied on the thorough research in regards to the identification of some difficult measurement error. In the sampling aspect, the mature multi-stage probabilistic sampling design is directly referenced, and there is a change from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ample Method to GPS Assisted Area Sampling Method. Moreover, a set of strict standards and procedures is established in the field implementation and data management. In the early stage, the earliest batch of quantitative research talents in political science were rapidly cultivated by means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professional training and field practice platform.

Key words: Survey in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Oral history, Quantitative studies, Political development

一、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政治学抽样调查

作为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抽样调查在政治学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抽样调查是根据概率理论从研究总体中抽选样本，并对样本进行结构化问卷调查的一种社会研究方法。^①也有学者将抽样调查研究归结为一种利用合理的抽样和标准化的问卷直接从社会成员中收集第一手资料，

① 参见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第10版）》，邱泽奇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208页。

并主要通过定量的统计分析来认识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的社会研究方法。^①正如杨明教授所指出的，“抽样调查是一种从研究者界定的总体中按照科学的方法抽取样本，并对样本进行调查的研究方法，如果这个样本的人口特征与目标人口的特征一致，对于这个样本的表述就可以代表对于目标人口的描述”^②。

政治学抽样调查是指针对政治学领域的研究主题，借用抽样调查方法对政治现象与规律进行探索的研究方法，最早起源于美国的政治学界。沈明明教授在接受访谈时提到：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抽样调查）在美国首先兴起。那时候，美国一批年轻的政治学者认为，研究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研究社会的各种问题，完全从理论上静态的解释已经没有什么可做的。所以，他们提出了一个概念，叫“relevance”（相关）。也就是说，要跟现实有点联系，而且能够跟踪动态的变化。这样，你的研究才有意义，也容易获得社会各界的认可，容易获得研究经费方面的支持。科学研究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人类知识的累积做贡献。所以，（他们）开始做各种各样“relevance”（相关）的事情。^③

正是在这样的学科背景之下，行为主义政治学主张采用科学的方法，对人类的政治行为进行经验的实证分析，从而使政治学成为一门经验的、可以验证和预测的行为科学。

中国政治学抽样调查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产生。任何一场社会变革的强度、速度及成功与否都不可避免地多数社会成员对于这场变革的认同程度和对变革的承受能力相联系。^④为了跟踪考察改革开放过程中人们的

① 参见风笑天：《社会研究方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43—179页。

② 这一定义是访谈杨明教授时他谈起的。杨明教授，与本文作者岳春颖进行访谈，音频录音，2017年6月15日。以下来自杨明教授的录音文字均与此同期采集。

③ 沈明明教授，与本文作者岳春颖、王大鹏进行访谈，音频录音，2017年10月25日。以下来自沈明明教授的录音文字均与此同期采集。

④ 参见杨明：《北京社会经济发展年度调查数据报告（1995—2004）》，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生活、观念、信心和承受能力等各方面的变化，积累时间序列性的经验资料，以便对上述社会变革中的重要问题进行尽可能客观的描述与研究^①，沈明明教授与杨明教授在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前身）的支持下，以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为主体，自1995年开始设计实施了北京社会经济发展年度调查（Beijing Area Study，以下简称“BAS”）项目。

BAS项目至今一直是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与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进行政治学抽样调查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学术平台。从提出理论假设^②到概念操作化^③，从调查问卷与抽样设计，实地执行程序的确立与设立标准到数据管理程序的建立和数据报告的撰写，以及借此调查平台而开展的量化研究人才培养途径，BAS项目都为中国政治学抽样调查研究确立了一系列的具体标准，起到了示范作用，成为中国政治学抽样调查研究与人才培养的一个典型代表。

基于以上的原因，本文选取BAS作为中国政治学早期抽样调查的典型案例进行口述史研究，对于我们还原中国政治学早期抽样调查的原貌，总结中国政治学抽样调查早期发展的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口述史的研究方法

本文之所以采用口述史的研究方法，是因为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国政治学早期抽样调查尚未开展过相关的系统研究，只有大量分散的文献资料，比如会议记录、历次调查的问卷和数据库，以及一些有关的影像资料；而在20世纪90年代参与政治学抽样调查的学者对于这一段历史仍记忆犹新。为了学科的承传与发展，也为了记录这一宝贵的历史，本文作者对早期参与中国政治

① 参见杨明：《北京社会经济发展年度调查数据报告（1995—2004）》，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② “假设”（hypothesis）指的是一种有关变量间关系的尝试性陈述，或者说是一种可用经验事实检验的命题。具体参见风笑天：《社会研究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5页。

③ “操作化”（operationalization）指的是在抽样调查的研究中，将研究者提出的研究问题依据特定的研究程序转化为可以观察的指标的过程。具体参见风笑天：《社会研究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5页。

学抽样调查研究的13位相关学者进行了深度访谈，还原中国政治学抽样调查早期发展的原貌，总结其学科特征，这也可以见证这些学者与中国政治学抽样调查研究一同成长的经历。正是这些学者所参与的一次次抽样调查共同推进了中国政治学抽样调查研究的初创、发展与当前的繁荣。

美国学者乔·古尔德（Joe Gould）于1942年最早提出口述史（oral history）的方法，之后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艾伦·内文斯（Allan Nevins）加以运用并推广。保尔·汤普逊（Paul Thompson）提出口述史是人们用自己的声音记述自己的历史，口述史的意义在于把历史引入群体，同时把群体引入历史，拓宽了历史研究的范围；同时，口述史也使人们重新认识了曾被忽视的实质性群体，在史学中产生一种积累式的运动着的变化过程^①。唐纳德·里奇（Donald A. Ritchie）认为口述历史以录音访谈（interview）的方式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是一位准备完善的访谈者（interviewer），向受访者（interviewee）提出问题，并且以录音或录影记录下彼此的问答^②；吴飞认为口述史是受访者与研究者合作的研究，研究者通过传统的笔录、录音、录影等现代技术手段，记录历史事件当事人或者目击者的回忆而保存的口述凭证。同时，他认为口述史是一种记录、发掘和认识历史的史学形式。研究者通过深度访谈，用录音设备收集当事人或知情者的口头资料，然后整理成文字档案，并与现存的文字档案核实，整理成文字稿^③；李岩松认为“口述史是针对个人在特定的场域空间内对社会和事件表述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民族、种族、国家、性别、年龄等现代‘分类技术’的控制，能够真实地呈现行动者在一定社会背景下的社会行动和社会记忆，具有独特的学科特征和研究优势”^④。

国内政治学界使用口述史来记录中国政治学早期抽样调查发展的文献尚属

① 参见保尔·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覃方明、渠东、张旅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4页。

② 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实务指南（第2版）》，王芝芝、姚力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③ 转引自何扬鸣主编：《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口述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序言。

④ 转引自孔寒冰编著：《在历史与现实间探寻中国：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巴斯蒂口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总序第6页。

空白，同时，目前学术界使用口述史的方式对学科发展进行记录的文献也非常有限，现有的文献是通过记人的方式进行记录^①。而本文使用的口述史研究方法则是通过记事的方式让熟知甚至亲身参与过BAS的知名专家学者进行集体回忆，来呈现出中国政治学早期抽样调查的原貌，从中总结其学科特征，也是一种方法上的创新。

三、中国政治学早期抽样调查的学科背景与特点

（一）中国政治学早期抽样调查的历史背景

中国政治学抽样调查的早期发展有两大历史背景：一是发端于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这是中国政治学抽样调查的时代背景。二是中国政治学学科的复建，这是中国政治学早期抽样调查兴起的学科背景。我国改革开放的客观需要推动了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这就需要政治学者全面研究中国改革发展的客观实践以及随之产生的一系列问题。这是对中国政治学抽样调查的现实需求。同时，根据学科发展的需要，北京大学在1982年重新设立了政治学本科专业，在1988年3月独立组建了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该系迅速成为北京大学培养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要求的高层次政治人才和公共管理人才的重要基地。^②正如赵宝煦先生所指出的，中国政治学学科的重建是中国政治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③，这推动了中国政治学抽样调查的蓬勃发展。

刚刚开始学科重建的中国政治学界很少有学者运用行为主义的视角从政治科学的角度对中国正在发生的政治现象进行实证的观察与思考，使用抽样调查作为研究方法的学者更是少之又少。美国哈佛大学阿什研究中心（Ash

① 美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科学的口述史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最早的政治科学口述史研究专著为Michael A. Baer、Malcolm Jewell和Lee Sigelman合著的*Political Science in America: Oral Histories of a Discipline*，由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于1991年出版。这本书通过口述史访谈的方式，对早期政治科学的研究者及其所做的政治科学研究进行记录。

② 对于中国政治学学科复建的论述，具体参见王浦劬：《中国政治学发展二十年的回顾与展望》，见中国政治学年鉴编辑委员会：《中国政治学年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页。

③ 参见赵宝煦：《中国政治学百年历程》，见中国政治学年鉴编辑委员会：《中国政治学年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Center) 主任托尼·塞奇(Anthony Saich)教授认为:“当时在中国做问卷调查非常困难。在20世纪90年代,抽样调查在中国还没有普遍使用。”^①

20世纪70年代末期,西方社会科学中的行为主义学派开始引入中国,为中国展开抽样调查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问卷调查与量化研究也是在此时引入中国,并在政治学与社会学中广泛应用。80年代初期,在中央政府的政策研究领域首先开始了问卷调查,包括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问卷调查和在美留学的政治学学者史天健教授在同一时期做的北京调查,这是有据可考的中国政治学早期的问卷调查。当时的中央农业政策研究室也在全国展开了几次问卷调查,1983年春天,为了了解农村实行的生产承包责任制政策的执行情况,以及评估这一政策,中央农业政策研究室委托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②的学生进行了调查。燕继荣教授和这一届参与调查的学生回到学校之后,分成小组撰写报告,他回忆起当时做调查的情况时说:“大概(20世纪)80年代,我们当时都参与过。那是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农研室(中央农业政策研究室)委托北京大学国政系(国际政治系)做的调查。”^③而温铁军教授回忆说:“(农村政策改革调查的问题)是完全重新设计的。所有的自变量、因变量和中间变量全部都是根据我们自己试验区点的需求自己设计的。”^④1987年,北京大学和密歇根大学合作开展了一项国际合作的大型抽样调查项目,

① 托尼·塞奇教授,与本文作者岳春颖、王大鹏进行访谈,音频录音,2018年9月5日。以下来自托尼·塞奇教授的录音文字均与此同期采集。托尼·塞奇教授是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对于中国政治学的研究,包括抽样调查方法的研究,了解颇深。

② 当时北京大学没有专门的政治学系,政治学设在国际政治系中。1982年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成立。2001年12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成立。这是北京大学政治学学院系建设的一个历史简介。当时有一些在国际政治系读书的学生留校任教之后,成为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和政府管理学院的教师,本书提到的沈明明教授、杨明教授、燕继荣教授都属于这样一种情况。

③ 燕继荣教授,与本文作者岳春颖、王大鹏进行访谈,音频录音,2017年7月11日。以下来自燕继荣教授的录音文字均与此同期采集。燕继荣教授参与过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的中国政治学最早的抽样调查。在1995年的时候,参与过BAS的执行工作。燕继荣教授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也使用过抽样调查方法进行学术研究。

④ 温铁军教授,与本书作者岳春颖进行访谈,音频录音,2017年9月20日。以下来自温铁军教授的录音文字均与此同期采集。温铁军教授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院长。1983年大学毕业后从事政策研究,1987年6—8月公派到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调查研究所学习研究设计,获“抽样调查专业结业证书”,并在世界银行总部完成后续培训。回国后为世界银行在华项目监测评估设计了多个县级抽样框并使用密歇根大学教材对农村改革试验区干部做培训,是中国率先学习并使用抽样调查的学者之一。

后来被学术界称为“四县调查”，四县调查的目标之一是为了系统了解改革开放之初，农村地区的人们对于改革所带来的经济变化的认知。这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治学第一个规范的、科学的抽样调查，为后来的调查项目确定了标准，提出了方向。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沈明明教授和杨明教授为主的一批年轻的北京大学政治学学者从西方学术界引进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①他们在行为主义与比较政治学理论视角下，运用抽样调查研究方法，开始对中国90年代以来的政治发展与变迁进行科学、实证的观察与思考。最为典型的中国政治学抽样调查项目就是BAS。沈明明教授具体谈及当时开展BAS的目的，就是发展出一个在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的支持下、中国国情研究中心自主设计的抽样调查品牌。他回忆说：“最初的几年要把研究方法当作我们培训的重点，把BAS建成学术训练的平台；同时，我们也做一些标杆式的抽样调查研究项目，给国内的政治学界提供一个基本的标杆，就是说一个严谨的抽样调查研究项目应该是什么样的。但是，这项调查研究的目的更多的是去指导青年教师和未来会从事政治科学研究的硕士生、博士生们。”托尼·塞奇教授也高度认同沈明明教授的这一想法：“明明（沈明明教授）提出了他的想法，进行BAS，主要借鉴底特律调查，希望建立一个长期的问卷调查数据库。”

（二）中国政治学早期抽样调查的目的与主题

抽样调查研究的目的和主题是它的“灵魂”。有了明确的研究目的与研究主题，才可以据此开展问卷设计、抽样设计、实地执行与数据管理等操作性程序。

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政治学抽样调查的主题非常广泛，主要包括政

① 沈明明教授于1984年至1994年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就读博士期间，受到了美国密歇根学派严格的实证研究方法训练，学会了从实证研究的视角分析政治现象，并在美国参与了多项实证调查。杨明教授在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任教期间，多次赴美接受实证研究方法的训练。1995年，沈明明教授接受赵宝煦先生的邀请，担任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杨明教授也于同年担任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副主任。

治体制改革、社会变迁与公众的政治态度与行为。严洁副教授^①回忆说：“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治学抽样调查的研究主题集中在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政治参与研究，包括公民政治参与意识与行为、乡村选举研究、政治态度与政治价值观研究、政治精英流动等方面。”^②风笑天教授也提及：“我的印象是90年代末中国公民政治态度的调查，主要是（关于）普通老百姓的政治态度、价值观这方面的主题。”^③对此，唐文方教授也持同样观点：“当时（研究）问题涵盖的面很广，包括民众的政治社会态度与行为的各个方面，内容非常丰富。”^④

杨明教授提到BAS的研究主题与设想，他说：“中国从1978年以来实行改革开放，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对改革开放的一系列问题进行研究就变得特别重要了。如果说，这样一场伟大的变革已经在改变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等，这场变革也直接影响着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改革开放对于中国的老百姓来说意味着什么？因为改革开放的强度、速度及成功与否都与老百姓对于这场变革的认同程度和对变革的承受能力紧密相连。所以，我们提出的研究假设是：当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对于变革持支持态度，并能承受变革所带来的冲击时，变革才会顺利地进行下去。”^⑤

正是出于这样的研究目的，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在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的支持下，自1995年开始了延续至今的BAS。他们所收集

① 严洁副教授于1995年加入国情中心，当时，她还是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的本科生。由于成绩优秀，她已经被保送本系的硕士研究生。她最初作为研究助理承担国情中心的研究工作。之后，她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继续深造博士和博士后。目前，严洁副教授是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副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② 严洁副教授，与本文作者岳春颖、王大鹏进行访谈，音频录音，2017年7月25日。以下来自严洁副教授的录音文字均与此同期采集。

③ 风笑天教授，与本文作者岳春颖进行电话访谈，音频录音，2017年9月28日。以下来自风笑天教授的录音文字均与此同期采集。风笑天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多次参与国情中心展开的抽样调查的问卷设计讨论会议。

④ 唐文方教授，与本文作者岳春颖进行访谈，音频录音，2017年9月21日。以下来自唐文方教授的录音文字均与此同期采集。唐文方教授曾与国情中心合作多次，他与已故史天健教授是美国学术界率先使用抽样调查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问题的华人学者。

⑤ 对于北京社会经济发展年度调查的研究主题与研究假设，杨明教授也曾在其多年主持的《北京社会经济发展年度调查数据报告》的前言中进行过详细阐述。

的历年数据，为中国政治学抽样调查研究的发展提供了科学严谨的实证研究材料。赵宝煦先生曾在《北京社会经济发展年度调查数据报告》的序言中明确提出了BAS的研究主题：“展示了在国家经济与社会的改革过程中，人们的观念、行为等方面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对于研究中国社会变革中的政治与社会、政府与公共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①

因此BAS研究的主题不仅仅服务于当时的研究需求，同时也包含对未来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的考虑。后来的中国政治学抽样调查研究主题的范围则更为广泛，不拘泥于政治学方面的研究，还呈现出交叉学科的特点，比如与新闻传播领域合作的关于媒体、态度与行为的研究，与法学领域合作的关于法制建设方面的研究，等等。

（三）中国政治学早期抽样调查的问卷设计

问卷是抽样调查研究非常重要的工具，某种程度上会决定研究的成败。问卷设计的目的在于将研究者在理论假设中提及的概念进一步操作化为受访者可以明白的问题，从而可以对研究问题进行结构化的测量。从访谈者的回忆中可以归纳出中国早期政治学抽样调查的问卷设计的以下特点：

1. 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问卷

在政治科学发展较早、经验较多的西方发达国家，其抽样调查研究相对成熟，所使用的结构化调查问卷经过多次检验，可以达到测量的目的和要求。中国政治学早期开展抽样调查研究时，经常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问卷。

具体到BAS项目，杨明教授的回忆更为细致与具体，他说：“当时（我们）借鉴了一些外国成熟的抽样调查研究。比如芝加哥‘一般社会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和‘底特律调查’（Detroit Area Study），方式是两个调查的结合。”杨明教授提出了BAS问卷设计“不变”的设想，他说：“我们有一个主问题部分，这个问题就是连续问，一直问到现在。一开始做的时候就是想做一个连续的中国政治发展的数据积累。”BAS的核心问题是北京市居

① 转引自杨明：《1995—2004北京社会经济发展年度调查数据报告》，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序。

民对家庭生活状况的自我评价、对改革开放的评价、感受和信心，以及对北京市社会经济各方面问题的认知。^① 具体参见表 1。

严洁副教授还补充道：“关于价值观测量的一些态度量表题基本上是用西方现有的态度量表题，比如测量人们对成功的看法，测量消费者的信心。”沈明明教授进一步解释道：“因为问卷这种方式从西方过来，而且问卷调查里面有一个原则，就是尽可能用成熟问题，自己编问题风险太大，而且成本太高。”

表1 《北京社会经济发展年度调查》固定题目

A. 本人与家庭生活满意度	B. 改革开放及其对家庭和个人得失影响的主观评价
C. 对国家当前、未来一到两年、五到十年的经济形势的评估	D. 对北京市当前、未来一到两年、五到十年的经济形势的评估
E. 对北京市所面临问题及其采取措施的评估	F. 对北京市政府解决最严重的问题的权限与资源的评估
G. 一般价值观（工作观、成功观、平等观、国际观、公民意识）每三年一个轮换	H. 投资、消费、收入、支出、职业等

2. 进行问卷“本土化”尝试

在中国政治学抽样调查的早期阶段，研究者除了借鉴西方成熟问卷中的问题设计之外，也在积极进行一系列问题设计方面的创新，即进行问卷“本土化”^② 尝试。

杨明教授补充了 BAS 问卷设计中“变”的设想，他说：“在 BAS 调查

① 转引自寇艾伦、高敏、李侃如、墨宁：《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24 页。

② 在这里“本土化”指的是在中国政治学早期抽样调查研究中，问卷调查中设计的问题符合中国语境，使得中国的受访者可以明白所问的问题。而“本土化”的概念最初指的是 localization，这一概念最早被应用于经济学领域，指的是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实施本土化的策略。“本土化”一词被用于社会科学之中，指的是在对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进行运用的过程中，为了更好地解释当地的现实情况，要充分考虑到理论的适用情况，将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加以改变或修正，增加其解释力，甚至在原有理论基础上提出新的究框架和范式。具体参见岳春颖、王大鹏：《中国政治学“本土化”理论的构建路径研究》，《南阳理工学院学报》2015 年第 3 期。

中，每年都会有不同的专题方向。主题围绕大的政治学范畴而开展的。主要是针对北京市居民对当年社会上出现的焦点和热点问题的态度进行了考察，通过这种方式来观察人们在当时社会出现变化时的基本看法与观念变化，作为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一种记录。”自1995年开始到2002年，BAS调查中所涉及的社会热点问题参见表2。

表2 1995—2002年《北京社会经济发展年度调查》中的热点与焦点问题

调查年份	具体热点问题	调查年份	具体热点问题
1995	腐败问题	1999	下岗和社会保障问题
1996	社会治安问题	2000	中国加入WTO
1997	环境保护问题	2001	申办奥运会
1998	亚洲金融危机	2002	神舟五号发射成功

严洁副教授对此也提出了相同的看法，她回忆说：“每年的热点问题，我们根据中国的情况做了更新，BAS里面的政策与改革方面的题目基本上都是中心自己设计的。沈（明明）老师、杨（明）老师是打基础的。比如，BAS里面的一道题：您觉得北京市是否在下列诸方面存在问题？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这一套题目基本都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她还补充说：“那时候问卷要做好几轮测试。因为那个时候很多题目都是新写的，没有什么积累，所以一道题要测试很多轮。”

沈明明教授回忆当时问卷设计的“本土化”尝试没有局限于中国政治学的研究范畴之中，还想扩展为国际比较。他说：“我们确实希望能够设计适合中国语境下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的问题只是针对中国自己，那在学术上的贡献也不大。还是希望能够编写一些问题，能够在其他国家、其他文化下也能够适用，这样就可以做跨国的比较。这方面做了很多很多工作，但是，直到现在，应该说还在努力中。”

目前，BAS中的“本土化”尝试已经在世界其他国家的问卷调查中得到

扩展。李磊（Pierre Landry）教授在博士生阶段就曾参与过BAS^①，他回忆说：“有一些问题是在中国创建的，后来在其他国家也开始运用。比如我跟越南的同事合作做一个抽样调查项目的时候，使用了许多中国问卷中的问题。我在突尼斯也在使用类似的问题。因此，这些问题在世界旅行，被重新评估和使用，并且有所完善和提高，从而有了一个有趣的生活经历。”^②

3. 为控制测量误差而使用的采访员观察记录

在抽样调查的过程中，测量误差的识别和控制是非常重要而又极易被忽视的一个环节。在中国政治学抽样调查的早期发展阶段，在问卷设计方面已经考虑到测量误差的问题。

BAS 当时识别和控制测量误差的方法要求采访员^③做观察记录，这种做法在其他的早期调查中并不多见。严洁副教授告诉我们：“测量误差主要体现在采访员与受访者两个方面；对采访员来说，出现测量误差的可能表现为：问卷作假、轻易接受受访者的拒绝、在问卷访谈中不中立或者不够规范；对受访者来说，测量误差主要包括受访者拒绝回答问卷或者没有能力回答问卷，也有可能是在问卷上作假或者随意回答问题，还会出现临时思考或者出现回忆误差，以及有他人在场时的社会压力。”沈明明经常说：“一定要避免 garbage in, garbage out^④，设计问卷的必须考虑如何识别和控制测量误差，这不仅仅是执行督导和采访员的事情。”在早期阶段，中国国情研究中心的每一次面访抽样调查都设有专门的题目用来识别和控制测量误差。

采访员观察记录是采访员对于访问时的情境的记录（例如是否有其他人在场、是否影响了采访质量、受访人是否合作、对调查有什么兴趣、疑虑等情况）。严洁副教授回忆：“当时的一些题目设计不用去考虑特别多的无回

① 李磊（Pierre Landry）教授是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教授，专注于中国政治与比较政治。他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1995年，北京社会经济发展年度调查开展之时，他当时作为博士生参与其中。之后，他一直是国情中心长期合作的抽样专家。

② 李磊教授，与本文作者岳春颖、王大鹏进行微信电话访谈，音频录音，2017年10月1日。以下来自李磊教授的录音文字均与此同期采集。

③ 采访员是抽样调查中进行面访调查的工作人员。在国情中心组织的面访调查中，采访员一般由国情中心的学生或调查实地的大学生担任，在执行采访员的工作之前，他们都要进行培训方可执行此工作。

④ 这是英语中的一句常用谚语，意思是“如果您输入的是垃圾，那么输出的也一定是垃圾”。

答，所以，对于受访人为什么回答不知道、为什么拒绝回答，就没有直接去问受访人，而是在采访记录中让采访员来判断。早些年，我们经常用采访观察记录来判断问卷质量怎么样，例如，发现有村干部在场并干扰受访人回答时，我们会要求单独重访受访人。不过，那个时候，技术手段还不够丰富，还没有把它作为无回答多重插补^①的辅助变量，当时的单元无回答^②与题目无回答^③也不高。”

现在，中国政治学抽样调查研究中问卷设计依然遵循早期抽样调查研究的问卷设计原则：在借鉴西方成熟的问卷设计基础上进行“本土化”创新。与早期阶段相比，现在的问卷设计则更为精细，对于题目的测量则更加精准，比如与实验设计相结合的问卷设计会有列举实验的问题设计与析因实验^④的问题设计等，而在调查研究的早期阶段所确立的务必严格控制测量误差的思想则一直发挥着深远的影响。

（四）中国政治学早期抽样调查的抽样设计

抽样调查的核心是样本的代表性，即是否做到了随机抽样。抽样设计最重要的一点是保证调查项目的科学性，能够在一定精度范围内推论总体。早期的许多抽样调查还远远没有重视抽样的问题。正如沈明明教授所说：“在当时，无论是学术界、政府，还是商业的民意调查，抽样的问题都是个弱项，而且不够重视。选择样本很随意，但是随意并不等于随机。”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抽样调查的抽样设计多是户籍抽样，但是户籍

① 在抽样调查的数据采集过程中，由于上述各种原因而无法获得某个样本的任何一项回答或者无法获得样本对某个或某些个问题的回答的情况越来越多，这在学术上称之为“无回答”。而在对于这些无回答的处理方式中，多重插补是近些年学术界广为接受的一种方法。“多重插补”是给每一个无回答，即缺失单元，插补上多个值。具体参见严洁：《缺失数据的多重插补》，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② “单元无回答”指的是被调查单元没有参与或拒绝接受调查。具体参见严洁：《政治学抽样调查中的“无应答”分布与影响》，《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③ “项目无回答”指的是被调查单位虽然接受调查，但对其中的一些调查项目没有回答。具体参见严洁：《政治学抽样调查中的“无应答”分布与影响》，《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④ 析因实验使用与现实生活中决策情境相似的不同维度的刺激（虚拟情境）评估受访者对于世界的相信程度、判断标准和决策规定。具体参见 Auspurg, Katrin, Hinz, Thomas, *Factorial Survey Experiments*, New York: SAGE Publications, 2014。

抽样无法抽取流动人口。而在 2000 年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流动成为不可忽视的现象，面对这样的现实困难，沈明明教授与李磊教授合作发明了 GPS 辅助地址抽样方法，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能够覆盖流动人口的随机抽样，两位教授的相关论文发表在 2005 年《政治分析》(*Political Analysis*)^①上。BAS 作为第一个实施 GPS 抽样方法的项目，见证了抽样设计从户籍抽样到 GPS 辅助地址抽样的变迁，并为 GPS 辅助地址抽样的最初尝试提供了调查研究的基础，这对中国政治学抽样调查乃至国际范围内的抽样调查都是一个突破性的贡献。

1. 户籍抽样设计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户籍抽样的优势在于它的准确性。沈明明教授回忆说：

在 2000 年以前，在中国做抽样调查，绝对是天堂，我们的户籍太棒了！到一个地方，你把户籍登记册拿到之后，直接在上面抽样就行。因为户籍里面有一个家庭所有成员的最基本信息，比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与户主的关系和迁入本地的时间，以及工作单位、地址，抽样要用的基本信息全有了，而且非常准确。到这个地址肯定能够找到（受访者），我们就是在户口登记册上做抽样。

李磊教授也认同户籍抽样的准确性。他回忆说：“20 世纪 90 年代，刚刚开始出现抽样调查时，那时户口非常准确。你去一个地方，拿到一个名单，会告诉你谁住在这里。那种情况下，名单是正确的。那时的抽样样本可以很好地代表总体。”

2. GPS 辅助地址抽样设计

当流动人口比例增加，户籍抽样方法又抽不到流动人口时，GPS 辅助地址抽样方法的使用便提上了日程。沈明明教授回忆说：

2000 年以后，人口流动的问题日渐突出。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

① 《政治分析》是当年美国政治学界排名第一的学术期刊。

变，户籍存在的意义就不大了，人们已经不再受户籍束缚了。因此，户籍从一个最好的抽样信息载体变成了一个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spatial sampling（空间抽样）就出现了。

对此，李磊教授也提出了自己的分析角度，他回忆说：

当中国加入 WTO（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的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比今天还要快，大量的农民工离开了家乡。大家都在讨论农民工、外地人。当时大量的农民工涌入城市，进入城市变得容易了。当时北京是很明显的，北京周边都是农民工，从其他地方来的这些人在北京周边居住。但是，这些人从来没有被抽样调查抽中。

李磊教授进一步分析：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BAS 的数据采集回来的时候，样本看起来越来越奇怪，因为大部分不移动的人其实看起来不那么有意义，他们是北京的永久居民，从来没有离开家。而我们却缺少那些新来的人的信息，因此，我们非常担忧。当时，大家都在谈论这种没有代表性的抽样，这个方法变得过时，因为中国有很多流动人口，但是，抽样调查却没有相应的数据。因此，我们想：我们是不是应该找到一个方式代替户口？GPS 辅助地址抽样是可行的、精确的方式，让我们可以获得同等概率的抽样样本，包括全中国样本中的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

关于 GPS 辅助空间抽样方法的理论假设，沈明明教授回忆说：“我们用 space（空间）的概念替代了户口的行政区划的概念。这样不管你在中国什么地方，都可以假定，我应该能抽中你、找到你，理论上说起来很简单。”对于这一抽样方法的贡献，沈明明教授认为：“GPS 辅助空间抽样能够把人口全都覆盖，这是当时的目标。但是，如果说真正贡献的话，还有一整套程序，但是，真正实际操作起来非常复杂。Pierre（李磊教授）和严洁做了大量具体的操作工作。”

2002年开展的BAS是GPS辅助地址抽样的首次尝试。李磊教授回忆说：

2002年夏季，我们在这一年的BAS中做了尝试，前后进行了两次BAS。第一次调查与之前一样，第二次使用了GPS的抽样方法。经过对比，我们发现，使用GPS的抽样方法，有三分之一的抽样样本没有户口，他们不是北京市的户籍居民。在北京，最有钱的那部分样本是流动人口，即企业家。他们拥有公司，非常富有。但是，在原来的抽样系统中却从来没有被抽中过。因此，我们意识到使用正确的方式测量街区的重要性。这样的抽样调查就会避免大的偏差。

关于GPS辅助地址抽样的具体操作，严洁副教授回忆说：“从操作角度来说，寻找稳定、操作成本低和边界容易识别的抽样单位非常重要。我们在2002年开始直接使用30秒经度和30秒纬度形成的半分格代替以前的村居作为抽样单位。在保证科学性的前提下，还能降低成本。”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抽样技术也日益发展并不断完善。目前，抽样技术与夜间灯光技术相结合，与小格人口数据相结合，与电子地图相结合，使得GPS辅助地址抽样更加精确和方便。这些都离不开早期的一系列探索和建立起来的程序。

（五）中国政治学早期抽样调查的实地执行与数据管理程序

中国政治学早期的抽样调查研究在完成确定研究主题、问卷设计与抽样设计之后，就进入实地执行与数据管理环节。实地执行是抽样调查数据的采集过程，早期的政治学抽样调查在实地执行程序 and 标准方面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不仅如此，抽样调查项目的成果最终都是以数据库的形式展示出来的，这些数据库产品在科学的抽样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数据分析。中国政治学的早期抽样调查在刚刚开展的时候，数据管理程序也如同抽样调查的实地执行环节一样，工作标准与程序都已经确立。它们推动了中国政治学抽样调查的发展，并且使得中国政治学与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变得更有意义。

1. 中国政治学早期抽样调查的实地执行程序

实地执行程序的标准确立包括一整套实地执行的各个环节标准的确立，其中包括督导员带队面访的模式与提高调查访到率的程序。

（1）实地执行工作程序的确立

抽样调查项目工作的开展需要确立一整套的实地执行工作程序。沈明明教授回忆说：“当时非常重要的建设工作，就是要把抽样调查的全过程做出一套标准工作程序（protocol）来。这个标准工作程序的确立是我主要抓的。现在中心使用的采访员手册的前几页都是我写的。”除了采访员手册之外，沈明明教授还回忆说：“当时问卷封面也是，还有抽样设计和抽样执行报告，实地执行的报告……这几个报告是当时我们自己建立的。因为在我们之前，做抽样调查的很多机构，这几个报告都没有。”

抽样调查的标准建设是结合BAS的实地执行开展的。严洁副教授补充回忆说：“我们做的包括执行中的一些文件，一套程序。有抽样登记表、采访进度表、督导员的复核表，还包括受访者礼品发放的记录，还有完成统计表、未完成原因统计表、问卷录入交接表等等。所有这些现场用的表格都是1995年的时候传下来的，都是一整套的。”

不仅如此，在做调查的过程中，调查团队都会给实地执行的抽样员^①、督导员^②和采访员购买保险，预防各种意外，这也是中国国情研究中心确定的一个重要的程序。沈明明教授回忆说：“我们做调查很难避免的事情，就是各种意外、各种自然灾害、交通事故、人身安全，这方面建设其实很重要的。”

（2）督导员带队面访模式的确立

在最初的抽样调查开展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是督导员带队面访模式的确立。沈明明教授回忆说：“督导员带队是很重要的，督导员带着采访员到实地进行面对面访问，这是采集到真实信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杨明教授也提出：

督导员带队进行实地执行是国情中心的一个特点。督导员要安排采访进

① 抽样员是在抽样实地执行的环节中到调查实地进行末端抽样的工作人员。

② 督导员是在抽样调查数据采集过程中负责监督、管理与协调抽样员与采访员工作的工作人员。

度，保证采访质量；负责带领采访员进入正确的抽样地址，正确使用户内抽样程序，访问抽中的那个人，收取问卷，核对当日完成问卷数量，并记录到问卷收发一览表上，如有差错，问明原因，及时处理；审阅问卷，每天必须检查当日完成问卷，及时发现问题，避免其再次发生。同时，督导员还要记录采访过程。督导员必须在采访进度表上对每个问卷的采访进程进行登记，认真填写工作日记及日采访总结表，并负责整理全部问卷。最后，每天向中心汇报工作进展情况，出现新问题立刻向中心请示后再行动。

燕继荣教授担任过 1995 年 BAS 调查项目的督导员。他对这段历史记忆犹新，他回忆说：“（19）95 年的 BAS 调查，我当时是作为督导员。全北京市有上千份的问卷，我天天看问卷到很晚很晚。”督导员带队模式使得早期阶段的问卷质量很高。严洁副教授回忆说：“我们问卷里面经常内嵌一些质量核查的问题，一直都有。那个时候因为学生社会实践的机会很少，所以他们很珍惜这种社会实践的机会。而且都是老师带着学生下去，老师做督导员，因此学生那个时候很少做‘糙活’，每次督导员核对完了问卷，问题很少。”

（3）提高调查执行访到率的方法及程序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政治学的早期抽样调查访到率很高。为了保证高访到率，在抽样调查中，都设计有事前给受访者和社区（农村）负责人写信的环节，是为了说明此项抽样调查的意义和受访者的的重要性。采访员在遇到第一次拒访之后，会有督导员根据明确拒访的原因做出相应策略的环节，如果是因为访员的原因则换访员，如果是受访者没有时间则换时间，三次明确拒访才由督导员决定是否放弃。这种严格的执行程序保证了当时抽样调查的高访到率。任莉颖副研究员回忆 1995 年做 BAS 的情景：“我记得当时燕（继荣）老师还说：‘我们的访到率只有 87%。’沈老师则回答说：‘只有 87%？这已经很不错了！’”^①

^① 任莉颖副研究员，与本文作者岳春颖、王大鹏进行访谈，音频录音，2017 年 7 月 4 日。以下来自任莉颖副研究员的录音文字均与此同期采集。任莉颖副研究员是在 1995 年的时候与严洁副教授一起作为学生研究助理加入国情中心。任莉颖副研究员之后一直以抽样调查方法作为她的研究方向。

2. 中国政治学早期抽样调查的数据管理

20世纪90年代，由于抽样调查研究处于起步阶段，人们对于数据库的一些认识还很有限。数据库的建立看似简单，而实际上包含数据管理的概念。沈明明教授回忆说：“数据库的建立实际上是一个更大的概念，叫‘data management’（数据管理），这个方面，我们也是做了很多建设，包括里面的规范、编码和数据库格式，以至于 weighting（加权）等方面都开始逐渐地规范化。”

在早期阶段，中国政治学抽样调查的数据管理程序需要确立标准的过程。沈明明教授回忆说：“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大部分做调查研究都是拿个数据库，根本没有 code（编码），没有 label（变量值标签），没有数据格式的统一，没有 data cleaning（数据清理），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实际上把 ISR（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中心）的规范移植过来。我们用 ISR 的数据格式来检验我们的数据格式，这方面也做了很多基础建设与培训。所有这几个环节都是在最初的那个时候确立，我们就是要成为学界的标杆，建立起一整套的标准程序。”也就是说，最终形成的数据库产品是有严格的质量控制的。对于这一点，杨明教授也这样认为：“一开始我们就是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要求的。”

双录入的原则成为数据管理程序建立的关键。严洁副教授回忆说：“最初BAS的时候，我们就坚持双人双录入原则。然后做比对、用SAS软件^①来做比对。数据清理包括查野码、查跳转，检查前后逻辑是否通顺。从BAS一开始的时候就设定的规范，一直沿用到现在。”

数据报告的撰写也是根据严格的标准进行的。杨明教授回忆说：“我们数据报告的撰写跟别的学术机构相比有不同的地方，我们会把抽样质量方面的数据报告出来。比如，会报告标准误、cv（均值变异系数）与设计效应。这是我们一直坚持的。”甚至，在BAS刚刚开展的时候，数据库里面的变量名都是精心设计的。杨明教授回忆到：“数据库方面，过去我们都是按照模块设计变量名的。比如说一组题目有主题干，有分支跳转，凡是主题干，都是

① 社会科学领域一种常见的高级统计分析软件。

V1010、V1020 这类在十位数上有变化，而分支题干则用 V1012、V1014 之类的，中间还会留有间隔，以便下一轮调查增加新的题目。”

综上所述，中国政治学早期抽样调查的实地执行程序与数据管理程序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粗到细与从非标准化到标准化的过程。实地执行程序中，督导员带队面访的模式与提高调查访到率的程序使得早期阶段的数据采集质量很高。同时，数据管理程序的确立为准确的数据分析与处理提供了保证。所有的这些程序标准到今天还在一直沿用。

四、中国政治学早期抽样调查中的人才培养和方法论建设

（一）人才培养

在中国政治学抽样调查的早期阶段，政治学抽样调查人才极度匮乏。在这种情况下，借助于政治学抽样调查的平台把学生培养成抽样调查的专门人才，就成为早期政治学抽样调查的重要目标。沈明明教授回忆说：“在调查项目中培养学生是一个很重要的目标，一届届学生慢慢地就累积起来了。”沈明明教授在给严洁副教授的专著《缺失数据的多重插补》的序中写道：“那时政治学做量化的还不多，途径只有一个——自己培养。”^①具体而言，沈明明教授回忆说：“训练学生是这样，未来如果他们能够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话，这段经历对他们来说是很好的训练。从我的角度来说，我希望有更多的人从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开始在量化、实证研究方面逐渐地能够拓展。那么，一届一届学生出来了，有一些走学术的路，很自然地就开始在这方面做出成绩。”

1. “总操心”的培养模式

一项抽样调查项目的开展离不开项目管理者。项目管理者职责是保证抽样调查项目的每一个环节都可以顺利开展，这是多项工作同时开展的一种组织能力的训练。在政治学抽样调查中，对于项目管理者培养有一个特有的词汇，即“总操心”。“总操心”的职务一般都是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和其他对中国政治学抽样调查感兴趣的北京大学的高年级本科生、硕士研究

^① 转引自严洁：《缺失数据的多重插补》，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序。

生或博士研究生担任。这些学生通常轮流担任抽样调查项目的管理者即“总操心”。沈明明教授回忆说：“‘总操心’实际上是一个概念，叫‘project management’的概念，就是把事情都当项目来做，大事情小事情都当项目来做，指定一个人负责。你明确了你的任务，然后你就需要制定计划。这在中心已经成为了一个程序。”

“总操心”作为一个制度建立起来是在1998年。严洁副教授回忆说：“‘总操心’是应该在（19）98年左右才有的，就是我们几个研究助理已经成长起来了。以前的‘总操心’都是沈老师自己，有时是他和杨老师。在我印象中，应该是在（19）98年左右才出现了‘总操心’的项目秘书。”对此，任莉颖副研究员回忆说：“（19）98年，我当了BAS的‘总操心’。在这一过程中，我理解了什么是调查研究，锻炼了我的组织协调能力，多个任务同时处理的能力，这些能力使我终身受益。”王裕华副教授也回忆说：“第一次当‘总操心’是在2004年的时候，我们做BAS。当时我在中心的第二年，每一年中心都会做BAS。当研究助理的这段经历对我之后到密歇根大学读博士乃至后来在美国任教都帮助非常大。”^①

中国政治学抽样调查的“总操心”制度培养了许多优秀的量化研究人才，除了前面提到的严洁副教授、任莉颖副研究员和王裕华副教授，还包括现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的燕继荣教授、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学系的陈涓副教授、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的孟天广副教授和复旦大学的左才副教授、胡鹏副教授等等。

2. 坚持带领学生进行实地调查工作

中国政治学抽样调查的实地执行与其他抽样调查不同的地方在于一直安排学生当督导员和采访员。为什么坚持使用学生当采访员？沈明明教授回忆说：“我们一直把执行当作训练学生的平台。用学生做督导员与采访员，一方面有训练、教学目的；另一方面，学生总归还是比社会上招募的人要单纯，

① 王裕华副教授，与本文作者岳春颖进行访谈，音频录音，2017年5月27日。以下来自王裕华副教授的录音文字均与此同期采集。王裕华副教授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就读本科期间参与国情中心的抽样调查项目。在就读硕士期间，系统地接受政治学抽样调查的学术训练，后赴美于密歇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现任哈佛大学政府系的副教授。

特意作假的还是少数，而且确实责任心强。”

沈明明教授说：“我要求所有国情中心的学生都要参加 BAS，就是先要学生知道实地调查是怎么回事。学生都要做抽样员、督导员与采访员。我们多年来一直坚持有组织地进入现场，不管怎么样都是把训练学生作为第一目的。”对于当时的具体执行情况，任莉颖副研究员具体回忆起 1995 年当采访员的情景时说：“1995 年开始做 BAS，有幸参与这个团队。当时我参与过问卷设计的讨论会，做过采访员与督导员。我记得当采访员时是跟着燕老师（燕继荣教授）一块儿去居委会，那是第一次去实地访问。那时候以小组为单位，坐着小面包车到居委会。”严洁副教授当时作为中国国情研究中心的学生助理也参与了 1995 年的 BAS，她回忆说：“当时大四的时候做的 1995 年 BAS 调查。先做了问卷修订的工作，然后又当抽样员，抽样完了以后带队去访问，自个儿也当访员。我当时既当采访员又当督导员。我记得当采访员的时候就发现有些题目在不同的受访人那里会有不同的理解，于是学会反思问卷设计。”

3. 全流程的培养方式

对于学生的培养方式是全流程的。沈明明教授回忆说：

从学生的角度有一个不一样的经验，就是有一些学术和动手能力的积累，同时我还永远强调一点，有一个拼搏的经验。我们把社会科学的研究项目看作一个载体，像 BAS，训练他们 team work（团队工作）中分工负责的能力。其实，每一个学生在项目中做的都是不可缺少的环节，如果不做好，就给下一个环节带来麻烦。比如，如果采访员不好好做记录的话，就会增加录入的人的困难。数据清理是非常讨厌的工作，但是还得做。慢慢地，学生们学会在一个团队里工作，你要学会怎么做一个团队成员。尤其是，我那个时候定下来的一个原则：要在规定的时间和预算内，在明确的质量标准下完成任务。这对学生是个挺好的训练，包括 leadership（领导力），responsibility（责任心），teamwork（团队工作）能力，还有应变的能力。

严洁副教授对此非常认同，她回忆说：“学生从做采访员、督导员和抽

样员开始，之后参与问卷设计、修改问卷、参与实地调查、质量核查，也包括数据库的建立和撰写报告、组织会议和安排诸多事项的时间表等等，基本都是全流程的培养。用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优秀的量化研究人才。”对此，任莉颖副研究员也结合自己的经历回忆起学生时代边做边学的培养方式。她说：“国情中心完全是 learning by doing（干中学）。我还不知道这些理论的时候我就已经在做了。”王裕华副教授回忆说：

其实我喜欢在 BAS 平台和其他项目上的这个训练。学的就是亲身实践。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可以很容易地得到中国的全国性社会调查数据。美国学生很容易就可以用这些数据来写博士论文或期刊论文发表。但是，他们很少知道这些数据是怎么来的。所以说，我在项目中受到的训练让我真的知道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这是对我最大的帮助。

（二）方法论建设

借助于早期的调查平台，除了培养人才之外，也开始了“本土化”的政治学研究方法论体系的建设。

1. 开设抽样调查研究方法课程

最早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开设抽样调查研究方法课程的老师是杨明教授。杨明教授回忆说：“为了完善政治学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介绍国外的先进研究方法，我开始讲授政治学抽样调查研究方法的课程。当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学习抽样调查的方法，也为了让学生可以参与中心开展的抽样调查项目，比如 BAS。”当问及抽样调查研究方法的演变时，他回忆到：“我是从 1989 年开始开设抽样调查研究方法的课程，一直到 2012 年我退休之前。这门课程一直是给本科生开的课，这么多年也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最开始介绍到底怎么做抽样调查，过程是怎样展开的。后来主要集中在问卷设计、实地调查与数据管理程序等方面。”

现在抽样调查研究方法在中国政治学研究中的运用越来越广泛，对于这种抽样调查研究方法的学习与研究的需求也在日益增多。面对这一情况，北

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开设了一系列的本科生与研究生抽样调查研究方法课程。这些课程以递进的方式设计,包括《应用统计学》《社会调查理论与方法》《政治学研究方法》《政治学定量测量》与《实证研究设计与数据分析》。严洁副教授回忆说:

抽样调查数据要用统计学方法做分析,我就在杨老师课程的基础上增加了应用统计的课程。不少学生听到统计这个词,就会有惧怕心理,担心数学不好,不敢选课。我就以案例研究为引导,以应用为主,学生们口碑相传,学习积极性非常高。后来在研究生阶段增加了方法论、定性与定量研究的结合,以及实证研究设计的课程。

此外,沈明明教授开设的《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课程,王浦劬教授开设的《政治学基础》课程与徐湘林教授开设的《政治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课程中都有专门的抽样调查研究方法的介绍。

2. 抽样调查方法论建设的贡献

早期中国政治学抽样调查方法论的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引入了美国成熟的抽样调查研究方法。托尼·塞奇教授肯定了早期中国政治学抽样调查阶段方法论建设的贡献,他说:“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对于抽样调查方法的引入。在此之前,许多的政策多为相关研究者的一些研究心得或者政策指导。这很难让人知道政策的有效性,而这方面,国情中心的抽样调查对此贡献卓著。从我的观点来看,受到严格方法论训练的学者对于中国政策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

由于早期方法论建设的贡献,40年来,量化研究方法在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中日益受到重视。王浦劬教授在其专著《政治学基础》中专门提到了政治实证测量和分析技术,他提出:“政治实证的测量和分析,是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西方政治学科学研究的基本技术手段。”^①他特别提出在展开调查和资料收集的研究程序中,通常的调查方式包括抽样调查。俞可平教授提出中国政治学的主要趋势之一“是日益重视定量分析”。他认为:

^① 王浦劬:《政治学基础(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页。

“政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规范研究和定性研究一直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随着中国政治学界对经验研究的更加重视，定量分析方法正在受到更多的重视，在整个学科中量化研究的比重在总体上不断增加，尤其在青年政治学者中，重视量化研究的比例越来越大。”^①

五、中国政治学早期抽样调查的意义

回顾 40 年的发展，中国政治学早期抽样调查的意义非凡。这一以方法见长的中国政治学调查的发展使得中国政治学步入实证的政治科学的阶段，并开始与世界学术界对话。尤其是历时性数据的积累使得研究者对于老百姓的认知有一个纵向历史的比较，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中国政治学走向政治科学阶段并与世界学术界对话

中国政治学走向政治科学的阶段必须有数据资料作为论据。严洁副教授分析说：“中国政治学要想成为科学，就必须得有可靠的数据资料作为论据才能说话。因为得有论据做验证，这就是从应然到实然的一个转变嘛。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中国政治科学的抽样调查研究也在挑战西方的既有理论范式。唐文方教授认为：“中国政治学用 data（数据）来说话，我对此有信心。中国的发展在统计上叫‘outlier’（离群值）^②。因为它不按常理走，跟经典的（西方）政治科学理论都对不上。而且，中国又这么大、这么重要，占世界 20% 的人口。所以，要把中国放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科学这个大框架之中。如果中国的经验模式能得到外面承认，那么，这对全世界范围内政治科学的理论都是一个根本的挑战，也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抽样调查方法连接了中国政治学与国际学术界。王丽萍教授认为：“抽样调查研究是我们目前最有资格说中国政治学可以跟国际学术界接轨和对话

① 俞可平：《中国政治学的主要趋势》，《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5 期。

② “离群值”（outlier），也称“逸出值”，是指在数据中有一个或几个数值与其他数值相比差异较大。

的一个领域。”^① 中国的抽样调查同时也会对其他国家的抽样调查产生影响。李磊教授说：“中国的抽样调查同时也影响了其他国家的抽样调查，这需要更长时间才会被人意识到并开始使用这部分抽样调查的数据。”而且，抽样调查的方法使得中国政治学研究走向世界。唐文方教授提出：“我觉得往小了说收集了可靠的科学数据，从大的方面说是为中国政治科学的发展奠定了 empirical（实证）的基础。让中国政治科学的研究走向世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没有这一步，国际学术界不会认可的。”

（二）历时性数据的重要性

历时性数据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BAS 从 1995 年开始一直到现在，积累了 15 年的数据，这是中国政治学最早的历时性调查数据，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正如沈明明教授、杨明教授与墨宁教授在他们撰写的《〈北京社会经济发展年度调查〉测量十多年的变化和稳定》中所指出的那样：

在中国，通过获得有代表性样本的问卷调查所提供的静态数据常常因为社会经济迅速变革而过时。本来，纵向数据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则尤为重要。问卷调查研究者似乎已经意识到这一点。……迄今为止，最有代表性的是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设计与实施的《北京社会经济发展年度调查》（BAS），该调查从北京市居民中抽取代表性样本，它始于 1995 年且还在进行。^②

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教授也对 BAS 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BAS 是非常重要的研究项目。观察一个地区一段时间内（老百姓）的态度

① 王丽萍教授，与本文作者岳春颖进行访谈，音频录音，2017 年 6 月 30 日。以下来自王丽萍教授的录音文字均与此同期采集。王丽萍教授在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就读本科期间参与过中国政治学最早的一项抽样调查项目。当时，她作为采访员参与抽样调查的培训与实地数据采集，之后，她毕业留校任教至今。她也因此使用过抽样调查的研究方法进行学术研究，发表过相关论文。

② 沈明明、杨明、墨宁：《〈北京社会经济发展年度调查〉测量十多年的变化和稳定》，转引自寇艾伦、高敏、李侃如、墨宁：《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新材料、新方法和实地调查的新途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21 页。

变化。现在已经积累了一些数据，这些数据使得对于问题的理解更加深刻。我认为，这些数据是非常有价值的。它们告诉你老百姓的一些认知，这些认知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这是真正重要的地方。”^①

（三）人才培养的重要性

在政治学抽样调查的早期发展阶段，以沈明明教授与杨明教授为代表的北京大学一批政治学、行政学和公共管理学的学者们利用大学教育、专业培训、实地调研实习平台等方式迅速培养了中国最早的一批政治学量化研究人才。1995年至今，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培养出的中国政治学量化研究的人才走向了全国各大高校、各级党政机关与事业单位以及知名企业。杨明教授回忆起：“我们的学生在全国很多高校都做得挺好的，比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林业大学等高校都有我们的学生。”除了为高校培养量化研究人才之外，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和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培养的学生在各级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也都成为顶梁柱。严洁副教授接受访谈时提起：“中心的学生去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或者企业的，因为之前受过组织协调和项目管理工作专业训练而很快在工作岗位上脱颖而出，成为这些单位的顶梁柱。”

可见，中国政治学早期的量化研究人才在全国的高校、党政机关与事业单位以及知名企业的不同岗位上都成为脱颖而出的杰出人才，为不同工作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六、结语

从上述学者对于BAS的集体回忆可以看出，中国政治学早期抽样调查已经具备规范性和前瞻性。在研究主题层面，中国政治学的早期抽样调查关注的都是国家、社会和公众最为关心的问题，是理论上急需探讨的问题。在调

① 李侃如教授，与本文作者岳春颖进行电话访谈，音频录音，2017年9月13日。以下来自李侃如教授的录音文字均与此同期采集。李侃如教授作为专家参与过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组织的中国政治学最早的一项抽样调查项目。

查方法的技术层面，进行了一系列的规范化的程序 and 标准建设：在问卷设计上坚持理论假设先导，重视概念的操作化，积极进行本土化尝试，进行问卷设计的同时兼顾测量误差的识别与控制；在抽样过程中坚持概率抽样，并创造性地从传统的户籍抽样过渡到 GPS 辅助地址抽样；在实地执行中确立了既能够顺利实施项目，又能高标准保证质量的程序，从而采集到真实可靠的数据，使得中国政治学的调查数据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在学科建设层面，借助中国政治学早期的抽样调查项目对学生们进行了严格的、专业的方法论训练，为政治学实证研究培养了第一批人才，这些人才在全国乃至世界知名高校继续从事着中国政治学的科研与教学工作。

目前，大数据的兴起、实验法与抽样调查的结合使得抽样调查看起来不再那么重要。但是，对于政治科学而言，大数据的最大问题是很多政治现象包括人们的政治行为是大数据所覆盖不到的，想进行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探索，还需要与抽样调查方法相结合。^① 实验法也在与抽样调查相结合，借助抽样调查的随机抽样的大样本和数据采集平台，可以有效地进行因果推论。^② 这些新方法使得政治学抽样调查依旧在不断发展。在新技术快速涌现的今天，如何能够进一步解决成本高、资源消耗多、组织工作难以及拒访率越来越高的难题，如何与大数据法和实验法深入融合，从而进行更为深入而广泛的研究，是新一代政治学学者需要不断思考的问题。

以数据记载历史，以实践创建规范，以调查培养人才，这是早期中国政治学抽样调查已经完成的任务，也将是现阶段政治学抽样调查所要坚持的方向。

① 参见唐文方：《大数据与小数据：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探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6 期。

② 参见任莉颖：《用问卷做实验：调查—实验法的概论与操作》，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3—23 页。

附录：北京社会经济发展年度调查受访学者名单

序号	受访人	受访人工作单位及职务	访谈形式	访谈时间	访谈人
1	王裕华	哈佛大学政府系副教授	面访	2017-05-27	岳春颖
2	杨明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 原副主任	面访	2017-06-15	岳春颖
3	王丽萍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面访	2017-06-30	岳春颖
4	任莉颖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 研究员	面访	2017-07-04	岳春颖 王大鹏 边彦歌
5	燕继荣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常务副院长	面访	2017-07-11	岳春颖 王大鹏
6	严洁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 授，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 中心执行主任	面访	2017-07-25	岳春颖 王大鹏
7	Kenneth Lieberthal (李侃如)	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布鲁 金斯学会外交政策资深专家	电话访谈	2017-09-13	岳春颖
8	温铁军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面访	2017-09-20	岳春颖
9	唐文方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主 任、讲席教授	面访	2017-09-21	岳春颖
10	风笑天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电话访谈	2017-09-28	岳春颖
11	Pierre Landry (李磊)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 系教授	电话访谈	2017-10-01	岳春颖 王大鹏
12	沈明明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 主任	面访	2017-10-25	岳春颖 王大鹏 任相宜

(续表)

序号	受访人	受访人工作单位及职务	访谈形式	访谈时间	访谈人
13	Anthony Saich (托尼·塞奇)	哈佛大学阿什研究中心主任	面访	2018-09-05	岳春颖 王大鹏

注：受访学者按接受访谈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

注：表格中外国教授的英文名字下面的括号中的名字是他们的中文名字。本文为了遵从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所以，在正文的叙述中会使用他们的中文名字。没有中文名字的教授会使用音译中文名字。无论是教授们自己起的中文名字还是音译中文名字在文中首次出现，后面都会备注他们的英文名字，以便读者可以确认这些外国教授。